

民国学术丛刊·文学史·文学理论编

主编 叶隼 副主编 刘训练



朱维之 著

基督教与文学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宋维之 著

基督教与文学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与文学 / 朱维之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8
(民国学术丛刊)
ISBN 978-7-5463-3454-7

I. ①基… II. ①朱… III. ①基督教 - 宗教文学 - 文学研究 IV. ①I10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6321号

基督教与文学

作 者	朱维之
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刘训练
责任编辑	史 宁 顾学云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3398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3454-7	定价: 35.00元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民国学术丛刊·文学史·文学理论编

主编 叶隽 副主编 刘训练

民国学术丛刊 总序

就中国传统之发展而言，清民之际乃是最重要的转型时代。这里的“民”不仅指狭义上的中华民国（北洋时代与南京时代又不同），也还包括了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帝制崩溃乃是一大转折，由此所开辟者非仅一朝一代之“更名换姓”，更具备我文明中国之步入现代世界的标志性意义。

虽然我们能看到的历史进程极其有限，但自清帝逊位、民国肇创之后，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毛泽东曾有意援用中华民国之名号，充分体现出其作为历史过程自觉者的伟人意识，可终究抵不过劝进者“开天辟地”的创新而最后重新更定国号。不过“民”之一字却始终未易，也可见出“清民易代”的长效性。

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史意识的逐渐恢复，大陆学界对民国一代学术也给予了高度认同，除了编撰学案、结集成史之外，重印昔贤经典、接续学术传统，则为不可不做的重要举措。除了早期的“民国丛书”（上海书店）以影印本大批量推出各类代表性的民国著作之外，还有诸如“民国学术经典丛书”（东方、中

国社会科学等出版社)、“民国珍本丛刊”(团结出版社)、“六点学术·民国系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至于以民国时代为主要内容的,诸如“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河北教育出版社)、“旧籍新刊丛书”(岳麓书社)、“蓬莱阁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各类出版社的“书库”系列也多以民国名著为主,如“商务印书馆文库”、“三联精选”、“新世纪万有文库·近世文化书系”(辽宁教育出版社)等;而清点 20 世纪或中国现代学术也多半以民国主打,如“二十世纪学术要籍重刊”(云南人民出版社)、“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河北教育出版社)等;至于以“国学”为题的,亦然,如“国学入门丛书”(中华书局)、“二十世纪国学丛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至于还有所谓“近人学术述林”(浙江人民出版社)、“大家小书”(北京出版社)等可谓不胜枚举,比比皆是。在这种背景下还要推出一套“民国学术丛刊”的意义究竟何在?

总体来说,随着 20 世纪初之废科举、兴学堂的“霹雳手段”,到了 1910 年代民国肇创后的办教育、立学术,基本已是“题中应有之义”,并未掀起绝大波澜。所谓“民国学术”也就是中国现代学术创立、发展时代的学术状况。虽然这段时间前后不到 40 年(1912—1949 年),但其所产生的丰硕学术成果却不容小觑。就此而言,重刊旧籍,其意决非仅是“旧物利用”;它更指向“重温历史”,意味着我们如何重新认知“昨日”、资鉴“历史”、确立“坐标”、走向“明天”。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充分利用“学术祖辈”的丰厚遗产,另一方面更需要有在历史行进过程中不断与“传统”进行对话的自觉意识,这个传统不仅包括中国文明的悠久典籍与先贤智慧,也理应关注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确立典范的“中国现代学统”。而在学术史意识之初的“回归学统”之外,也要有能力在宏观审视世界现代学术发展的背景中从容反省,

我们的学术前辈在传统崩裂、现代初萌、一切仿佛开天辟地的时代里究竟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又留下了怎样的缺憾和距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那代人既要为中国现代学术初期之成就定尺度,也要为中国在世界现代学术谱系中争位置,可谓“重任在肩”。就此而言,出版这套“民国学术丛刊”也还有编选者、导读者、出版者自身的学术寄托。

相比较时贤的“文字飞扬”,这些尘封在故纸堆中的民国旧书自也有其“晦涩艰深”的一面。这不仅是说文字的易代不同、学科的自然演进、关怀的时代语境等等,也还有“今人”与“前辈”的价值取向、文章风格乃至世道人心之间难以避免的缝隙和差距,故此,我们也希望能借助大家的导读,以高深学问而作浅近文字,借助生花妙笔的华彩章句,使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我看来,或则可把至今仍在进程中的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历程,分为三段六代人。就时段来看,可以分为三段:1912—1952年;1952—1992年;1992—2030年前后。本丛书涉猎范围,基本上是第一阶段和前三代人。第一阶段可谓“黄金时代”,虽政治变动频繁、战争此起彼伏,但学人仍作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第二阶段基本属于荒废和接续时代,1990年代以后的学术史自觉意识的确立才真正接续了原有的现代学术传统;就第三个阶段来说,中国现代学术才刚刚开始不久,仍在进程之中。在这个阶段里,我们是否能拿出“过硬”的成绩来,对于“中国崛起”至关重要。因为,一方面是条件基本具备。当此时代,学术史意识已成常识;全球化趋势已大势所趋;电子信息化的应用也都相当普及。中国现代学人可以基本在同一个平台上,面对西方学者,挑战和机遇并存。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做?另一方面,国

家之发展需要学术的进步、思想的创生。撒切尔夫人不无傲慢地宣称,中国崛起不足为虑,因为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只输出物质产品而没有精神产品;在她眼里,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文化产品可言。未来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期。而最关键的,则是中国的大脑,作为学人的学术与思想,因为他们将成为中国前进的灯塔。故此,学人之承担国运之责任也不可谓不重。当然,这里重点关注的仍是民国,将其定义为狭窄的概念之内,即传统上的 1912—1949 年间。虽然就长时段眼光观之,这短短的 37 年间实在不过“白驹过隙”,可其中孕育的学术生机可能,却确实是“浩浩然大哉”。

就代际变迁来看,可分六代人。原生代(即介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过渡一代人),以沈曾植、罗振玉、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等为代表,他们多半在 1870 年前后出生,在传统学术方面造诣深厚,部分学人又借助留东(日本)之便,而得以窥见西学门径,乃是传统学术的终结者与向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一代人;第一代,1890 年前后生人,以陈寅恪、胡适、汤用彤、吴宓、郭沫若、冯友兰、朱光潜等为代表,他们多半具有良好的国学修养,并得时代之机遇而能留学西方(主要是欧美,但如陈垣、钱穆等未留学),不以求学位为终极目标,在五卅前后留学归来,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创立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颇多人集中在北大、清华这两大重镇;第二代,1910 年前后生人,以钱锺书、费孝通、冯至、季羨林等为代表,他们仍具有一定的旧学基础,但除极少数外已难与前代人比肩,多半在抗战前后留学归来,获有博士学位,倾向专门之学,以外国做研究对象者不少,他们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对 1980 年代后的学术薪火传承有重要意义;第三代,1930 年前后生

人,以李泽厚、庞朴、叶秀山、谢冕、刘再复等为代表,他们多半在一种救亡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中成长,多半没有留学机会,学术训练与知识积淀都有先天不足,但具备很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以及自学成材的能力,部分学者能利用特殊的时代境遇仍作出了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第四代人,1950年前后生人,以葛兆光、陈来、陈平原、桑兵、汪晖等为代表,他们多半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或研究生,有机会到国外进行学术研究,接触到西方的学界状况,部分人也攻读了学位,并借助改革开放和中国发展的东风,形成了自觉的学术史意识,重新接续了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较之前代学人明显有突破,积累了相当的学术成绩,是目前学界的领军人物;第五代人,1970年前后生人,这代人基本尚在形成之中,他们是第四代学人的弟子辈,同时又与第三代学人产生某种“亲密接触”。当然,这样一种划分不是绝对的,它的特征概括也只是相对而言,其目的是为理解民国学术提供一种参照系和整体学术地图坐标。

民国一代学术,主要是第一、二代学人的学术空间。当五四一代以一种“元气淋漓”的激烈方式而确立起自己在学术、文化场域的主导性占位后,后五四一代当然深受影响,纷纷漂洋过海学习师辈的成功经验,立志“为中国文化寻路”;在1930年代后,他们的弟子辈多半放洋归来,成为抗战建国年代中国学术发展的生力军。尤其是西南联大的熏陶下,可谓成就了“两代学人”的精彩共舞时代,中国现代学术不但开创了极为辉煌的“事功年代”,且不说自然科学家如华罗庚、陈省身、周培源、吴大猷、曾昭伦等人的成就,就列举一下人文学者的著作吧!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闻一多的《神话与诗》、金岳霖的《知识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锺书的《谈艺录》、潘光旦的《优生

与抗战》……正所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西南联大纪念碑文）。

当前辈学人的学术史勋绩以如此绚丽、厚重甚至不乏悲壮的方式集中呈现时，他们坚守“书斋”的努力和“纸上苍生”的努力，就不仅是一种资源，一种能被后世学人再生利用的宝贵学术资源，而且也自然形成一种坐标，一种后代学人可以由此出发、寻得自己精神安身立命处的“大学术”！这样一种坐标，或许还不能给我们在市场经济中苦苦支撑的纯正学人以实在的“物质支援”，但朱自清先生拒绝美国救济的选择，却仍有那样一种无言的力量。这样一种坐标，其实传递给我们的，更是一种传统，一种中国学术积淀千载、现代重生，完成转型之后又规定未来民族血脉的纯正学统。这，才是最值得发覆的一层含义。

相比较原生代人的元气淋漓、第三代人的先天不足、第五代人的行进之中，那么，目前最能代表中国现代学术创造实绩的，是第一、二、四代人的学术成绩。尤其是作为承上启下、接续学统的第四代人，他们可谓“后来居上”，已经贡献出了相当不凡的学术成绩，而且在著述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不凡的表现。诸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2卷、汪晖《现代中国思想之兴起》4卷、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桑兵《国学与汉学》等皆堪代表，相信不但可以“藏之名山”，亦确可“传之后世”。但恐怕不得不承认的也是，在第四代学人中确实尚未出现如陈寅恪、钱锺书那样横贯而通的大家人物。

民国一代学术，开启中国现代学术的纯正源头，其功用也不可谓不大。希望我们这些来此探胜者，不要采玉宝山，空手而还。重温第一、二代学者的学术史贡献，不但可以使我们借鉴学

习前人呕心沥血的资源宝藏,而且更可以重温激情岁月的开创时代的学人精神。通过民国学术的重要成就的梳理和重版,我们希望能再现那代学人的“岁月峥嵘”。无论是在文史哲等人文领域的“确立典范”,还是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凡起例”,我们看看著作的题名和作者的立意,就知道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领域前贤曾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曾确立了一个如何辉煌的起点?本丛书虽然没有严格的学科划分,但却并非不具备学科史的基本眼光,邀请的导读专家就是从这样一个层面考虑。而在一般意义的学科划分系列之外,又特别增辟了“海外博士论文”系列与“学术研究译著”系列。前者希望借助民国学人在留学时代的精彩创发,让我们一窥兼采中西之后的学术规训之作究竟可以达到怎样的一种层次,虽然其撰作语言并非中文,可这毕竟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借助学术父辈们资鉴他山之玉的具体成果,希望不仅能将他们呕心沥血而移玉东来的学术译著化为今日后辈负重前行的重要资源,更期待藉由此一窗口展现那代学人胸怀天下的“世界学术”之整体认知。敬请读者关注。

陈寅恪先生曾批评当时的中国学界谓:“国人治学,罕具通识”(《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他这是以世界学术的眼光来衡量正在创立期的中国现代学术,其批评不可谓不严厉,其言辞则不可谓不中肯。吾辈或可加一句,“有之,自寅恪先生始”。作为中国现代学者第一人,寅恪先生强调“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他不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确立起关乎中国现代学术根本的价值观,为后世学人之立精神;更以治学态度的“通识观”确立起学人微观层

序

《基督教与文学》是青年协会出版的青年丛书中,最值得吾人注意,最能惹起青年批评讨论,最能引起文学青年兴趣,最有宏教希望的一本著作。

这是因为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年富力强的青年,因为他做本书的希望,因为他思想的立场,因为他向当代青年挑战,因为他向教会的宣教师下最亲切的忠告,因为他也向全国文学青年下“哀的美敦书”,因为他见了远象,他要和许多同志同享这远象,因为这本书是将来一部更伟大的著作的导言。

作者朱维之教授,少年时文采斐然,早岁为师友所尊重。留学日本有年,返国后,任福州协和大学讲席,五年后来沪,任沪江大学国文讲席者又五年,这十年中,不仅是诲人不倦,为及门者所爱戴,且能学而不厌,潜心著述。已出版者有《中国文艺思潮史略》、《李卓吾论》、《沙恭达拉与宋元南戏》,与其他论文杂著散见各文艺及专门杂志中者,已经有百余万言了。

八·一三事变,沪江大学教职员,损失颇巨。难作时,十之

八九,仅以身免。“背上之衣与两手所携”以外,一切“留在背后”,都不及救。朱君累年辛苦的成绩,创作有《中国戏剧史》、《中国民间文学》,译述有拜伦的《该隐记》,提埃茂的《艺术与宗教》,皆已脱稿待校,惜被毁灭。国难期间,文人最痛苦的遭遇,便是看见自己心血的结晶,受无辜的蹂躏。这是很能使人灰心馁志的,然而朱君却不因此而灰心,四年来孤岛中教学益勤。

青年协会总编辑吴君耀宗聘朱君编著《基督教与文学》,朱君开始写作时,曾以计划来与我商酌,接谈过几次,我便离沪赴陪都;今春相遇,则全书已脱稿。他不忘旧约,使我得先睹之快,并嘱我为它写序。我虽向来嗜好宗教的文学,但二十年来,我的时光多耗费在大学行政方面,余力亦消磨于粉板及讲台之间,自己学问本分上应该努力的心理实验室中的工作都顾不到,遑论文学!为文学专著作序,这真是班门弄斧了。然而朱君坚请,并且他在少年时期曾经从舍弟廷蔚习西文,又是与吾同籍东瓯,大家又是沪上基督徒作者团契的契友,有这三重交谊,便不容推辞了。

全稿送来时,我正患肋膜炎,在仁济医院求医。我倚枕把它读完,使我竟日忘倦。

国难以来,个人的图书被难四散,不仅朱君与我同此痛苦,多少知交都罹此厄,沪上各大学的图书室所留者,也是无几,在此时期中,能下笔写这样的著作,我一方面极钦佩朱君的勇敢,不避艰难,一方面佩服其学业的造诣,因为参考书如此的缺乏,时间又如此的短促,竟有如此的成功。若假以较长的岁月,丰富的图书,其造就将何如耶?我愿读者评论此书时,当牢记此书是国难时期困守孤岛,功课忙碌的教授业余的产物,是在缺乏参考书的环境中所写成的,读者若有疑难,我敢代表作者声言一句

“欢迎指导”，以俟再版时修益。

基督教在文学史上的成绩至巨大而且重要，这是尽人皆知的。然而论者只能举其大概，之有系统的著述，在基督教先进国中，也不多见。朱君此编，在我国实为空前的第一部著作。他的贡献是举隅的。在这广大问题上，朱君为文学青年指出范围，使有志研究者有可遵循的途径。他并不是为整个基督教文学的领土，做鸟瞰式的地图。他所举的：圣经、圣歌、祷文、说教的讲章、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耶稣传……虽然不是基督教文学的整个领土，却已经是膏腴千里，心目所及，一望无垠了。

作者告诉我，他有志作《基督教文学史》，作者之高足章申女士及姜建邦君，亦均有志写《中国基督教文学史》，将来有志竟成之后，对于其他基督教文学作品，与有关于基督教文学的作品，当做更普遍的提举陈述。本书名为《基督教与文学》，不过是一种概论，里面所举的作品，不过是举例，并不打算遍举详备，读者不要因为寻不着自己所爱好的作品，便来责备本书作者的挂一漏万。

本书导言是作者个人叙述写作本书之经验，也是他思想立场之供状。他所陈述的，不少精警之言，譬如他说：

我写这书的时候，有两种希望：第一，希望基督徒青年多发生文学的兴趣，随时注意基督教本身的文学，使自己的宗教生活美化，深刻化；更能接受文学底新挑战，扩展基督教文学新的前程。第二，希望我国文学青年多发生对基督教的兴趣，多注意世界文学中基督教元素底重要性；更能接受基督教底新挑战，使我国文学发出新的光辉。

嗟乎,这岂仅是作者个人的希望!当代中国基督徒在编辑室中埋头从事文学工作的同志,教会学校中辛苦执教鞭的同志,奔波南北,出席各种合作会议的同志,二十年来心坎中“说不出的叹息”,都被这几行浏亮的文章和盘托出了。作者真是画龙点睛,使人读了,深感“吾道之不孤”。

作者以为:现实的思想与浪漫的思想,在文学史上对立,互为消长,已经过几度冲突;但几度冲突之后,各能“认识对方的伟大”。今日“唯心”“唯物”的对立也是如此。这不仅是独具眼光的看法,且是一种勇敢的希望。因为他从一般的趋势看来,相信对立之后,有“十分接近”之可能。这一点希望,渗透了本书。作者虽轻描淡写,却留下一幅极有重大性之远象,这远象是我恳切希望读者共同享受,共同研究,共同去实现的。

旧时代的贡献是祖宗的努力,“现在我们成了世界一环时,急需新的精神,新的品格,新的作风,来做新的文学贡献”,作者这样的呼召当代的青年。“新文学中单有异教的现实面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基督教的精神元素”,这是何等坦白的忠告!“现在基督教对我国文学青年做精神上的挑战,对我们民族品格挑战,要在我们底文学里注入新的血液”,这是何等重大的宣言!当代文学青年,或在风花雪月的柔性文学中消磨者,或专在炸弹,潜艇,独裁,毁灭的暴性文字中盲撞者,读了本书也许会“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

本书的命题,是《基督教与文学》,虽然有专章讨论说教与文学的关系,而其本身却不是说教的作品。但著者讨论“耶稣传”时,先叙述“诗人耶稣”与“耶稣底作品”,这两节是离开传统的宗教立场的言论,却饶有趣味。因为作者从文学立场的欣赏,表现出信仰的虔诚。试问国内多少经坛,有几篇讲章能有同样动

人的力量,引导彷徨在思想歧路的心灵,来拜谒循循善诱的大师,听他用慈祥的声音,讲浪子回头的故事?谁能领导忧虑压迫的心灵到伯勒斯丁的山坡,听他讲田野中的百合花,讲天空的飞鸟?谁能领导冷心叛教的信徒到加利利海滨,听他“一唱三叹”的低声查问“爱我否?”说“喂我的羊!”

本书未谈神学,未讲宗教,只用欣赏文学的心怀来邀请青年说:“你来看!”我相信此书出版后,吾国读书识字者,和青年以外,当有不少的尼哥底母,要在黄昏后,灯下来拜谒大师,寻求重生之道。

著者本书将来之收获,不仅是全国图书馆中,有千万后起之秀向收发员说:“为我找那一本中国基督教文学史中的第一部参考书!”在这多愁多难的年头,无论在热闹都市里,在冷落破碎的乡村中,有许多埋头苦干,兴邦建国的青年,读了此书,要与二三同志携手到以马迺斯去,在小村里关门擘饼时候,心目忽然开了,彼此相告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这便是作者的大收获。我希望宣传福音者,与一般的热心信徒,不用咬文嚼字的方巾气来检讨本书,却用欣赏大处落笔的眼光来了解此书,用分享的热诚来大胆地介绍此书。

不必等待著者所计划的《基督教文学史》脱稿,也不必等待他的高足章申女士或姜建邦君的《中国基督教文学史》成功,就是这导言式的十六万言的小书,已经有它特殊的使命,它能使使命传达于多数青年,这是我相信不会落空的希望!

病中读完全稿,听一夜的暮春冷雨,白衣者数次来巡,使人深觉夜长,但凄迷的冷雾,到底与黑夜同去了,海色入窗时,和煦的阳光接踵而至,窗上垂帘,床畔屏风,都抵抗不住。我想起本书第三章“圣歌与文学”所引述的麦西荪的《爱歌》来了。“不忍

弃我的爱”，是基督教文学的力量源头。这“不忍弃人的爱”，如今依旧在天壤间到处“苦中找人”。那些被骄傲所充斥，为私利所蒙蔽，为个人，为种族，为国家的自私自利，为权力、欲望所驱使，不惜使千万无辜的人民，在海陆空中，受血肉横飞的惨酷，这种残暴的心，到底是不必惧怕的，因为他终久有一天，会被不忍弃人的爱所找着，终有一天，“不能拒绝”他。我“知道应许不会落空，天明不再有泪”。

我再读第三章，荏弱的信心，重得一番坚振，忘记了绑带所捆扎的，使我呻吟的肋膜炎，我伏枕曲身，奋笔疾书，不知写得已经这么冗长了。

一九四一年大斋节中，在孤岛仁济
医院内科病室。刘廷芳